

單一選區與複數選區 相對多數制下的選民策略投票

黃秀端*

- 一、前言
- 二、國內外相關文獻探討
- 三、資料來源
- 四、黨際間選票的轉移與黨內間選票之轉移
- 五、選舉制度、政黨認同強度與選民策略投票
- 六、結論

近年來國內有關選舉之研究雖然不少，但是鮮少有學者討論不同選舉制度之差異是否影響選民之投票抉擇。我國總統、省市長及縣市長選舉採單一選區多數投票法，立委選舉採複數選區相對多數制，本文旨在探討選民在如此不同之選舉制度下是否有不同的策略投票行為？

本文利用立委選舉、省市長選舉以及總統選舉的調查訪問資料以及歷年來中選會的選舉結果資料，來比較分析在單一選區以及複數選區單記投票制下，選民之投票決定是否會有不同之策略性思考，以及家庭其他成員是否相互影響。

就整體而言，我們發現在單一選區中選民的策略投票為黨際間選票之轉移。換言之，在單一選區中如果有三個或三個以上政黨存在時，支持實力較弱的政黨的選民為避免選票浪費，會將選票轉給兩大黨中他較不討厭的政黨，所以選票轉移是從一個政黨轉向另外一個政黨。

反之，複數選區的選票轉移是黨內間之轉移，即選民為了使選票不致浪費於超強或過弱之候選人，以極大化政黨在選區內之席次，而將選票從該黨中的某一位候選人轉移到另外一位候選人。因此我們將可能預期歷屆行政首長選舉的各政黨得票率之波動程度遠高於複數選區之選舉。

*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專任教授
東吳政治學報/2001/第十三期/頁 37-75

就個人投票抉擇而言，在單一選區中，政黨認同愈強者越不可能進行策略性投票，因為此將意味將其寶貴之一票投給他黨。相反地，在複數選區中，政黨認同越強者，越可能進行策略性投票，因其選票之轉移是在同黨內候選人之間，其目的是為了增加該政黨在選區內之席次。就家庭成員而言，在單一選區中，同一家庭之成員應集中全力支持同一候選人，除非家庭中不同成員有意識形態或政黨認同之差異。但是，在複數選區中，家庭中成員可能因為配票原故，而支持不同候選人。

關鍵字：策略投票、選舉體系、單一選區多數代表制、單記非讓渡投票法、政黨抉擇、政黨認同、配票

一、前言

制度的安排會影響權力的分配，形塑政治人物追求其目標的方式；並且限制了公民控制政府的能力。同樣地，選舉制度決定了選民如何投下其神聖的一票，選票是如何集結的，以及集體的選民票如何轉換成爲政府的職位；各國的選舉制度不盡相同，在這些制度中規範了選票如何轉換爲國會席次，選區大小，門檻高低，選票結構以及選舉的時間，同時也無形中決定了選民之投票行爲。

選舉制度對於政黨的數目，意識型態的多元性，席次的比例性，以及政黨採取的策略都會有深遠的影響（Duverger, 1954; Rae, 1967; Lijphart, 1984, 1990, 1994; Riker, 1986; Katz, 1980; Powell, 1982, 1989; Taagepera and Shugart, 1989），是許多學者研究出來的結論。然而，如同 Machael Steed（1985）所言，我們對於選舉制度是如何影響選民投票行爲的所知卻不多。雖然早在四十幾年前，Maurice Duverger（1954）在其出版的《政黨》一書中便提到選舉制度對選民投票抉擇可能產生的影響，但在後繼的研究中皆把焦點放在選舉制度對政黨體系之影響，而其對選民投票行爲的影響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一直到最近幾年來才有學者開始關心在單一選區多數投票制下的選民投票行爲（Heath et al., 1991; Niemi et al., 1992; Fieldhouse et al., 1996; Blais et al., 1996; Hsieh et al., 1997）。

Duverger（1954）認爲在單一選區多數代表制的國家會使得選民不傾向於支持小黨，而其它選舉制度則較不會有此種情況發生。當有三個黨在單一選區多數代表制中，而其中一個政黨的實力較弱，選民會慢慢地察覺，假如他們繼續支持第三黨，則他們的選票是浪費的，因此，很自然地便將其選票投給兩大黨中，他比較不討厭的一黨，以避免他最討厭的政黨當選（Duverger, 1954: 226）。此種假設似乎相當合理，一個理性的人應該不太會投票給一個他認爲毫無勝選機會的政黨。選民此種反應，Duverger 稱之爲心理的因素

(psychological factor)。

1994 年台北市長選舉時的「棄黃保陳」，1996 年總統選舉傳聞甚多之「棄彭保李」，「棄陳保林」，1998 年台北市長選舉的「尊王保馬」，以及公元 2000 年總統選舉的「棄連效應」等皆證明此種策略投票之可能性。

策略性投票是指爲了影響選舉結果，使其呈現更爲滿意的結果，而投票給自己最喜歡的政黨或候選人以外的政黨或候選人 (Galbraith and Rae, 1989: 126)。在單一選區中，策略性投票假設在任何有三位或三位以上候選人所參選的選區，那些有強烈欲望要讓在職者下台者，會投票給最有可能擊敗在職者的反對黨以達到其目標；或者是那些認爲自己最喜歡的政黨或候選人沒有任何希望當選時，爲使選票不致浪費，轉而支持次喜歡之政黨或候選人。

與我國同樣採取 SNTV (單記不可讓渡投票法) 制度之日本 (在 1994 年政治改革之前) 以及我國歷年來民意代表的選舉經驗，提供了另外一種形式之策略投票。在複數選區中，選區應選席次雖大於一，然而不管應選席次多寡，選民皆只能投一票，候選人所得票數不得轉移給其他候選人，因此被稱之爲單記不可讓渡投票法。在此種制度下，政黨爲了贏得較多席位，勢必提名不只一位候選人出來參選，但是候選人發現說服支持同黨候選人的選民轉而支持他，遠比說服支持他黨候選人之選民要容易，因此同一黨候選人相互競爭是必然的。而在此種制度下，關心選舉結果的選民，在策略上會放棄「超強」或「太弱」的候選人 (Cox, 1994)。他們放棄實力太弱的候選人，其理由與單一選區選舉相同；他們放棄超強的候選人是當他已篤定當選，但是同黨其他候選人仍舊有機會獲得席位時。換言之，策略投票選民可能會投給在當選或落選邊緣的候選人，一方面可以減少選票之浪費，另外一方面企圖影響選舉結果，增加所屬政黨之席位。

在立委或其他民意代表選舉中，我們可看出部份策略投票之端倪。例如 1983 年立委選舉中康寧祥的落選以及 1986 年謝長廷的落選，都是被選民認爲篤定當選，而將其選票投給其他候選人，造成他們兩位反而落選之情況，也因如此在選舉前幾天常常可以看到所有候選人紛紛告急的文宣。近幾次立

委選舉，我們更可以看到不同形式之策略投票行爲，1991年以及1995年北市南區以外之選區，民進黨支持者大多採取自動配票方式，以免超級候選人反而成爲犧牲者或者成爲超級吸票機。而在1995年立委選舉，新黨在提名之候選人超過一位以上之選區以及民進黨在南區皆採取根據出生月或身份證字號等強制配票方式。就如同Cox and Munger (1989)所言，在SNTV制度下，如果所有選民都做策略性投票，那就只有那些競爭激烈之候選人可能當選，超強、超弱皆不可能當選，反而使得選票與席次無法達到平衡狀態，但是在菁英份子的動員與呼籲下，反而可以使選票重新分配，而達到平衡狀態。

基於以上的理論，本文將探討在不同選舉制度下選民是否真有不同之策略投票行爲？我國由於行政首長選舉（包括總統、直轄市長以及縣市長）採取單一選區多數代表制，而立委選舉採取複數選區相對多數制，正好提供了此兩種制度下選民策略性投票行爲之比較。至於，選民的策略投票行爲是否會對選舉產生決定性之影響，則不在本文研究之列。選民有策略性投票行爲並不見得會對選舉結果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因爲很可能如劉義周（2000）所提，如果不同政黨選民同時採取策略投票行爲，反而可能使得效果相互抵銷。

二、國內外相關文獻探討

2.1 在國外研究方面

有關選舉制度的影響討論中，最有名的說法便是所謂杜佛傑定律（Duverger's Law），在社會無嚴重分歧的情況之下，單一選區多數代表制會導致兩黨制。導致此種情況的因素，其中一項便是前面所提到的選民心理因素，即選民在心理上不會支持毫無希望當選之候選人。而對政黨或候選人而言，若在某一選區中，總是由某一政黨的候選人當選，其他各黨爲求勝利，也會聯合各黨，共同對抗該一常勝的政黨。對原先佔有優勢之政黨而言，爲

確保其優勢，也會設法聯絡其他政黨「這種合縱連橫之工作將會持續下去，直至每一個生存的政黨都有合理的機會贏得過半選民投票數之支持為止。因而，此種選舉制度，會傾向使競賽場上只剩下兩個相互競爭之政黨。」(Downs, 1957: 124)。

Duverger (1954) 將選民心理的因素 (psychological factor) 與機械因素 (mechanical factor) 所造成的小黨低度代表性 (underrepresentation) 加以區分，選民的心理因素的產生是獨立於機械性的因素，機械性因素牽涉到政黨的選票轉換成爲席次的問題。關於選舉制度對於政黨體系或是得票率與議席之間的關係，近年來之研究相當豐碩 (Rae, 1967; Taagepera and Shugart, 1989; Laakso & Taagepera, 1979; Lijphart, 1990; Ordershook & Shvetsova, 1994; Reed, 1991; Cox, 1994)，但是這些並非本文探討之重點，因此不在此贅述。

至於選民的心理因素部分，即選舉制度對於選民投票抉擇的影響則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Grumm (1958) 認爲杜佛傑所提的心理因素並不存在，但是他並未測試此假設，因爲他所擁有的資料並不足以測試它。Douglas Rae (1967: 83) 持與杜佛傑不同之觀念，他認爲儘管單一選區多數代表制具有向心力以及減少分裂的力量，對於大黨以及有規模之政黨有利，對小且新興之政黨不利，但是這些小黨仍是不斷地奮鬥，政黨競爭也不會因此消失，自由黨在英國雖然低度代表，但是一一次又一次的選舉證明仍然有些選民繼續浪費選票給他們的候選人。

Shively (1970) 企圖檢驗英國和德國在單一選區時是否有選民心理因素存在，他發現雖然心理因素存在，但是非常小，很容易被其它因素吞噬。相反地，Cain (1978) 發現在 1970 年英國大選中策略投票不管從集合資料或調查訪問資料之分析皆可以得到證實。當選民認知到他的第一偏好毫無當選機會時，而前兩名的差距又非常接近時，他較可能採取策略性投票。不過 Cain 的研究之後，策略性投票仍未受到重視，一直到八〇年代末期到九〇年代初期策略性投票才開始在英國受到注意。策略性投票研究在英國越來越受到學者之重視之原因是在 1983、1987 年和 1992 年三次選舉中，反對陣營中確實

是有候選人提出這樣的策略，企圖擊敗在職多年的保守黨。

利用選區中每一個政黨在兩次選舉中選票的變化，Galbraith and Rae (1989) 證實的確有反執政黨的策略投票出現，因此在上次選舉中，得票第二名者往往是策略投票之受益者。Johnston and Pattie (1991) 則將 Galbraith and Rae 的研究更進一步的發展，他們證實當在野者可以擊敗在職者的成功機率最高時，策略投票發生的可能性最高；同時，在上次選舉時，兩個反對黨的得票差距越大時，則在下次選舉時，越有可能從得票較少的政黨轉移到得票較高之政黨。不過此種利用選區資料之分析並不能真正瞭解選民的心理因素，同時也可能低估真正的策略性投票的比例 (Catt, 1989)。因此，有一些學者開始利用調查訪問資料來更進一步深入探討策略性投票。

Heath et al. (1991) 估計在 1987 年選舉約有 6.5% 的主要政黨選民有策略性投票動機。當受訪者在被問到投票給某一政黨的原因時，回答「我真的比較喜歡另一個政黨，可是它在選區中並無任何勝算」，則被視為具有策略性投票動機。Niemi et al. (1992) 在操作性定義上把策略性投票選民的標準放寬，那些回答「我想要投給可以贏的政黨」也被視為具有策略性投票動機。用此種方式，策略性投票選民的百分比可以達 17%。他們更進一步證明，當選區中，自己喜歡的政黨候選人，越是落後前兩名候選人，則該黨策略性投票之比例便越高。政黨認同越強者，策略性投票愈是不可能。除此之外，他們也發現教育程度、對選區選舉結果的知識、和對領先政黨的負面感覺等因素皆與策略性投票有關。Evans and Heath (1993) 對於 Niemi 等人所採取的測量方式頗有微辭。不過在 Evans (1994) 的另一篇文章中，他卻發現在 1992 年大選中，策略性投票選民增加為 9%，反映出策略性投票機會之增加。Fieldhouse et al. (1996) 也發現就政黨而言，他們對幾個競爭激烈選區的重視，也將使得選民策略性投票比例增加。

除了以上幾篇對英國選民的策略性投票外，Blais and Nadeau (1996) 也曾利用調查訪問方式分析 1988 年加拿大選舉，他先找出那一群可能會面臨策略性投票選擇的選民，其百分比佔所有受訪者之 20%。接著，他試圖去發掘

這些有機會面臨策略性投票的選民，有那些是真誠投票，那些是策略性投票？最後，再進一步探討在那些情況下，選民的策略性投票傾向會增加。在三人競爭之下，當選民對於第一偏好和第二偏好的差異不高，而對第二偏好的喜好程度遠勝於第三偏好時，則策略性投票機率便會增加。同時，當選民認知到第一偏好與第二偏好的勝選機會有很大不同時，而同時第二偏好與第三偏好間的競爭相當激烈，差距相當微小時，策略性投票傾向亦會增加。此種發現基本上與策略性投票的心理因素符合。

在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的選票集中於兩黨候選人的情況，在兩輪投票制的第一輪投票並不會出現。根據法國自 1965 年首度舉辦總統直接民選以來，歷次皆是群雄並起的局面，而且從來沒有一次選舉在第一輪投票中有任何候選人獲得超過半數選票，不再進行第二輪投票。由於選民預期到會有第二次投票的機會，其在第一輪的投票行為勢必與相對多數決下之投票行為不同（王業立，1998）。第一輪投票時，他們會支持理念與其相近的候選人，而不考慮該候選人會不會當選。第二輪投票中，政黨或候選人之間的合縱連橫關係將會是相當的複雜，甚至牽涉政客之間的利益交換（王業立，1996）。但是選民的投票行為是否隨著政客間的表態與聯盟而轉變呢？可惜缺乏這方面的實證研究來佐證。

Cox（1994）以日本為對象，研究在 SNTV 制度下，是否會產生選民放棄實力超強及太弱之候選人，他的答案是肯定的。同時，他也發現弱勢候選人被棄之機率遠比超強候選人高。依此邏輯，Cox（1997），Jeese（1999），和 Hsieh and Niemi（1998）皆發現在複數選區中真正具有競爭能力的候選人數目為 $M+1$ ， M 為應選席次。日本在 1994 年修改選舉制度，改採單一選區多數代表制與比例代表的混合，而 Steven R. Reed（1999）發現在採取新選舉制度的第一次大選（1996 年 10 月）中，有很明顯的策略投票跡象。在單一選區有較高獲勝機會的候選人獲得的單一選區票較比例代表票多；反之，在單一選區希望較渺茫者，獲得的比例代表票多於區域選舉票。但是這些研究都是用政黨在各選區之得票率與席次變化作分析，而並未採取個體的資料。

筆者以為欲瞭解選民是否作策略性投票，需要以選民個人作為分析之單位，方符合其理論假設。

綜合以上分析，策略性投票研究雖然漸受重視，但是卻缺乏對不同選舉制度的投票抉擇之有系統比較。學界缺乏以選民角度來看不同選舉制度對選民投票抉擇影響之研究，可能是由於行為科學重鎮之美國，缺乏此種制度上之差異，來吸引學者之研究。

2.2 國內的研究情況

國內對於同一選舉制度所造成的影響之研究，則以謝復生教授在此方面之著墨甚多，如他在 1986 年《政大政治學報》發表的〈選舉制度與政黨多寡〉和《政黨比例代表制》一書，1989 年於《中山社會科學季刊》發表之〈從選舉制度與選民結構看我國今後政黨政治的走向〉，以及 1991 年的“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The Cas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不過謝復生的研究仍舊較傾向於機械因素的部份，如選舉制度對政黨多寡以及得票率和席次之關係。

公元兩千年總統大選，由於三強鼎立，選戰膠著，因此是否會採取策略性投票以免最不喜歡的候選人當選，便成為眾人關注之焦點。國內學術界也因此開始出現與策略性投票相關之論文。莊文忠（2000）從選舉預測的角度觀察，發現在此次總統選舉中不管用何種方法預測；預測過程中，連戰被高估了 10 % 左右，陳水扁及宋楚瑜則分別被低估 6 % 及 7 %。作者認為此種誤差其中一部份可能是由於選民的策略投票，如果把棄連效應放入考慮所得之預測投票率確實是較接近實際投票結果。劉義周（2000）則應用賽局理論（game theory）中的三人賽局來分析總統選舉中連戰、陳水扁和宋楚瑜運用棄保策略影響選民動向的各種可能與得失，不過如果參與競賽之各方都採取棄保策略，則棄保策略之作用，並不如想像大。黃德福和張佑宗（2000）則企圖分析具有策略性投票傾向者的政治社會背景以及他們最後實際投給那

一位候選人之間的關係。不過這些文章皆僅是針對此次總統選舉中選民對三位候選人的棄保行為來探討，並沒有任何作品分析不同選舉制度下的選民是否有不同的棄保策略，而同時國外學者也很少做如此的比較，因此本文希望透過對在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及複數選區相對多數下的選民策略性投票的比較，更進一步瞭解制度如何形塑選民的行為。

三、資料來源

爲了真正瞭解在單一選區多數代表制以及複數選區單記投票制下，選民投票行為之差異，本研究將採取三種不同方式來進行，首先是利用中央選舉委員會歷次選舉投票記錄¹，來瞭解各選區內不同選舉之下，各政黨得票率變動的情形，亦即在單一選區和複數選區之下，是否因爲選民的思考策略不同，使得政黨得票率之變化亦有差異？

選舉結果的總體資料並無法幫助我們真正瞭解選民投票時的心理因素。爲彌補總體資料之不足，本計劃更進一步利用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政治體系變遷與選舉行為研究室多次的選舉調查資料：如「政治體系變遷與投票行為：民國 84 年第三屆立法委員選舉研究」，「1996 年總統選舉總統選民投票行為之研究」，民國 87 年「第四屆立法委員選舉之分析」，以及「三黨競爭下的台北市選民投票行為研究：民國 87 年台北市長選舉的分析」，在這些問卷中有很多與選民投票抉擇相關題目²，利用問卷訪談結果可以瞭解選民是如何投票的？是否會視選情發展而決定他的選擇？

由於調查訪問資料蒐集時，其問卷設計的目的並未針對本計劃的特定主題而設定的，因此有一些問題並無法從問卷中得到解答，欲更深入瞭解家庭中的成員在投票決定之互動過程，本研究更進一步選擇了十個個案針對受訪

1. 感謝政大選研中心提供中選會歷次選舉投票記錄。

2. 相關題目請參看附錄（一）。

者與其家庭成員做深入訪談，不過因為訪問的個案很少，這些資料僅能作為輔助而已。儘管如此，相信在此三種不同資料的相互配合與分析下，可以讓我們對於在不同制度下的選民投票抉擇有更清楚之瞭解。

四、黨際間選票的轉移與黨內間選票之轉移

我國由於立委、國民大會代表以及縣市議員選舉皆採取複數選區單記投票法，而總統、直轄市長及縣市長選舉採取單一選區多數制，因此有機會就此兩種選舉制度來比較是否在不同制度下選民的投票因素考慮會有所不同，特別是當選舉競爭激烈時，選民的策略投票思考模式是否有所差異。

在單一選區之下，如果只有兩黨候選人競爭，則選民只能做真誠投票（*sincere voting*），但是如果有三個或三個以上的候選人存在時，則可能有兩種情況的策略投票，第一種為 *squeezing effect*，即當兩黨競爭非常激烈，而第三黨毫無希望時，第三黨的選票將會流向兩個競爭激烈的政黨（Shively, 1970; Spafford, 1972）。與此非常相近的則是 *wasted vote*，浪費選票的名詞來自於單一選區相對多數的選舉制度之下，對於全國性的小黨而言，選民在心理上相信在此種情況之下投給第三個小黨的選票是浪費的（Duverger, 1954; Rae, 1967）。

不管是 *squeezing effect* 或是 *wasted vote* 兩種現象都必須仰賴選民對於可能結果之認知以及基於此種期望所作的選擇的合理性（Cain, 1978）。當個人感到他的第二偏好和另外一黨競爭激烈的時候，此時他較可能捨棄第一偏好而從事策略投票。當第二偏好和另一領先政黨的差距增加或者是第一偏好的競爭性增加時，這時候真誠投票便會增加。

但是選民如何判斷他喜歡的政黨已失去競爭性，進而採取策略性投票呢？利用選區集合資料分析之學者大多採取計算前一次選舉第一名與第二名政黨得票之差距，以代表兩大黨競爭的程度，並以第三黨與第二黨得票之差距來代表第三黨是否具有競爭性。然而此種估計有一些根本上的問題，即選

民是否真的記得上次選舉的結果呢？特別是自從解嚴以來，台灣選舉不斷，不同類型選舉的比較是不恰當的，而兩次同一類型選舉之間又已經舉辦了幾次其他類型選舉，選民是不可能有如此良好的記憶。即便選民有很好的記憶，然而由於每次選舉參選的候選人不同，其競爭性可能有別，例如 1994 年和 1998 年台北市長選舉，新黨與國民黨候選人在兩次選舉中的競爭性差異頗多。Mark Fey (1997) 因此認為選前的民意調查結果提供給選民的資訊將成為選民判斷候選人競爭能力的重要依據，也唯有如此杜佛傑理論才能達到平衡效果。

無論是 squeezing effect 或是 wasted vote，我們可以看出單一選區中的策略投票強調的是從較弱的一個政黨的選票轉移到較有希望的政黨，因此其選票的轉移是黨際間的轉移。相反地，複數選區的策略投票則是黨內不同候選人之間的選票轉移。複數選區中，由於每一選區可以選出多位候選人，因此小黨只要獲得 $V/M+1$ (V 代表選區總選舉人數， M 代表席次) 的選票，便可以肯定獲得席次，所以認同該黨的選民無須放棄自己政黨的候選人，只要集中全力，便有可能在該選區獲得席次。

不過複數選區常常會因為候選人人數過多，或選票分配不均，形成現任者或被認為篤定當選者反而中箭落馬之情況，但是由於選票是在黨內之間相互轉移，因此選區中各政黨得票率變化之幅度不若單一選區中各政黨的得票率變化大。換言之，複數選區中，個人在歷次選舉的得票可能起伏很大，然而政黨得票卻不如此。

台北市是最值得比較的地區，自從新黨於 1994 年參與選舉以來，台北市便成為三黨競爭的地區，在單一選舉中，特別是市長選舉，由於兩次選舉民意調查結果，前兩名競爭相當激烈，便有 Blais and Nadeau (1996) 所言策略性投票機率之增加，因而有所謂的「棄誰保誰」的情況出現。

表一為台北市自從新黨成立以來，各類公職人員政黨得票率之比較，屬於單一選區的選舉有 1994 與 1998 年的台北市長選舉以及 1996 與 2000 年的總統大選，屬於複數選區的選舉包括 1994 與 1998 的台北市議員選舉以及

1995 與 1998 的立法委員選舉。在單一選區選舉中，國民黨得票率最高是 1998 年台北市長選舉的 51.13%，最低為 2000 年總統選舉的 21.9%，相差 29.23%；而在複數選區中，國民黨得票率最高的是 1998 年台北市議員選舉的 40.08%，最低為 1995 年之三屆立委選舉的 30.71%，兩者相差 9.37%。民進黨在單一選區中得票率最高的亦為 1998 年台北市長選舉的 45.91%，最低為 1996 年總統選舉的 23.34%，相差 22.57%；在複數選區選舉中，民進黨在 1994 年四屆立委得了 36.31% 為最高，在 1994 年的台北市議員選舉之 30.08% 為最低，兩者僅差了 6.23%。至於新黨在單一選區選舉中的起伏更大，1994 年的台北市長選舉得了 30.17% 的選票，然而 2000 年的總統選舉卻僅得到 0.1% 之選票，兩者相差達 30.07%，因為不少新黨支持者放棄了無勝選希望之李敖，或是因為較偏好獨立候選人宋楚瑜，而改投他。在複數選區中，如同筆者的預期，選票落差就沒有那麼大，最高的 1995 年三屆立委選舉的 28.62% 與最低的 1998 年四屆立委選舉之 17.30%，相差了 11.32%。

表一、單一選區與複數選區政黨得票數與得票率之比較（台北市）

◎ 單一選區選舉票數與得票率								
	國 民 黨		民 進 黨		新 黨		其 他	
	票 數	得票率	票 數	得票率	票 數	得票率	票 數	得票率
1994 台北市長選舉	364,618	25.89%	615,090	43.67%	424,905	30.17%	3,941	0.28%
1996 總統選舉	541,721	38.90%	338,895	24.34%	346,272	24.87%	165,541	11.89%
1998 台北市長選舉	766,377	51.13%	688,072	45.91%	44,452	2.97%	0	0
2000 總統選舉	347,564	21.90%	597,465	37.64%	1,876	0.1%	640,261	40.34%
◎ 複數選區選舉票數與得票率								
	國 民 黨		民 進 黨		新 黨		其 他	
	票 數	得票率	票 數	得票率	票 數	得票率	票 數	得票率
1994 台北市議員選舉	544,670	39.05%	419,505	30.08%	302,409	21.68%	128,095	9.18%
1995 三屆立委選舉	364,513	30.71%	426,539	35.94%	339,605	28.62%	56,142	4.73%
1996 國大代表選舉	432,462	32.50%	467,846	35.16%	375,787	28.24%	54,644	4.10%
1998 台北市議員選舉	589,907	40.08%	455,613	30.96%	273,195	18.56%	153,078	10.40%
1998 四屆立委選舉	516,456	34.94%	536,705	36.31%	255,746	17.30%	169,117	11.44%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與政大選舉研究中心，『歷屆公職人員選舉資料庫』。

透過圖一與圖二的曲線圖比較，更可以看出兩種不同選舉制度下，政黨得票率變動的幅度。國民黨自 1994 年以來在複數選區之選舉皆未能突破 40.08%，但是在 1998 年單一選區的台北市長選舉卻能突破 51.1%，此種情況可能是新黨放棄沒有當選希望的王建，轉而支持較有希望之馬英九之故。當然影響政黨於歷次選舉中的選票波動因素很多，包括候選人的條件、選戰的策略、當時的國內外政治及經濟環境…但是若是不同的選區、不同類型的選舉、同類型但不同時間的選舉、不同的選戰議題、以及不同的候選人，其顯現的模式都是一樣的，那麼這些干擾因素就不是那麼重要了。

即使是沒有像台北市那樣，具有競爭力的第三黨出現，在新黨勢力相當微弱之地區，單一選區選票之流動仍舊是較容易受選舉類型或候選人魅力所影響。以宜蘭縣為例，不管是省議員、國大或立委選舉，甚至立委席次由二席變為四席，國民黨和民進黨之得票由圖四中可以看出相當穩定，兩黨在歷次選舉中得票率高低起伏最多不超過 5%。同樣地，在台南縣複數選區選舉中各政黨的得票曲線仍是相當穩定（見圖六），單一選區選舉中則因不同類型選舉而有所起伏（見圖五）。

洪永泰（2000）在其〈政治版圖重組〉的一篇研討會文章中，比較近年來選舉的政治版圖，發現民意代表和行政首長選舉結果有不一樣的政黨得票分布型態。整體而言，民意代表選舉國、民兩黨的得票情形都很穩定，從 1992 到 1998 年四次選舉，國民黨最高得票 52.48%，最低 45.63%，平均 48.36%，標準差只有 3.18 個百分點；民進黨的變化更小，最高 33.6%，最低 29.82%，平均 31.27%，標準差僅有 1.68 個百分點，新黨則以 1995 和 1996 兩年間為其高原期，票源固定在 13% 到 14% 間，不過之後就走下坡。行政首長則因候選人因素影響選民投票抉擇較大，所以各黨得票的整體加總呈現較大之起伏。此種研究結果，更進一步證實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的選票在黨際間轉移，因此選舉結果各黨得票率呈現較不穩定之狀態；反之，複數選區之下的民意代表選舉，選民選票是在黨內不同候選人之間轉移，因此各黨得票率歷年來呈現較穩定狀態。

圖一、單一選區中各政黨得票率曲線圖（台北市）

圖二、複數選區選舉中各政黨得票率曲線圖（台北市）

圖三、單一選區選舉中各政黨得票率曲線圖（宜蘭縣）

圖四、複數選區選舉中各政黨得票率曲線圖（宜蘭縣）

圖五、單一選區選舉中各政黨得票率曲線圖（台南縣）

圖六、複數選區選舉中各政黨得票率曲線圖（台南縣）

五、選舉制度、政黨認同強度與選民策略投票

在單一選區選舉中，每一個政黨只提名一位候選人，具有政黨認同的選民只要投票給他所認同之政黨的提名候選人，便是政黨投票（Mann & Wolfinger, 1980）。希望自己偏好的政黨獲勝，他只要投票給該黨提名之候選人即可。當他所偏好的政黨遠遠落在第三名時，爲了不使選票浪費，他可能會選擇領先的兩個政黨中他較不討厭的一黨，以避免他最討厭的政黨當選（Duverger, 1954: 226）。當然並不是每一個支持弱黨的選民皆會捨棄其政黨而就他黨。那些該黨的忠誠支持者，儘管毫無獲勝希望，仍會繼續支持其政黨。另外，那些對於候選人或政黨之間獲勝機率沒有充分訊息者，也不可能轉移投票給他黨。

同單一選區的選民一樣，複數選區下的選民也不願意將其選票浪費，如果他知道自己所支持的候選人遠遠落在其他候選人之後時，便可能放棄該候選人而轉移其選票；反之，若其所偏好之候選人遙遙領先其他候選人，因而認爲多我這一票是多餘的，也是浪費的，因此選民在此種情況下也可能做選票轉移。換言之，在複數選區相對多數制下，把選票轉移到那些在當選邊緣的候選人，是使其寶貴的一票產生效用的最佳途徑（Cox, 1994）。在單一選區中前面提到一黨只有一位候選人參選，因此不願意見到選票被浪費時，只好將選票投給他黨；但是在複數選區之下，一個政黨可能提名多位候選人，因此他通常會選擇將選票轉給同黨在當選邊緣的候選人，不過若是人人皆依此邏輯而投票，則恐怕「超強」或「太弱」的候選人皆無當選機會，反而是原來在當選邊緣者當選了（Cox, 1994）。當然並不是所有的選民會有同樣地的考量，那些對候選人獲勝機率毫無概念者，只有從事真誠投票，而不可能做策略投票；或者是爲某一候選人的死忠支持者，亦不可能拋棄他的候選人，唯有那些關心選舉結果者才會有策略投票的行爲。換言之，當你關心選舉的結果時，便會想辦法將資源用於當選邊緣之候選人，如此對選舉結果的影響

會大於將資源投入落後或領先之候選人。

在複數選區單記投票制的不確定性很高，如果大家都做真誠投票，那麼超級候選人可能成為超級吸票機，如余政憲於 1989 年增額立委選舉時囊括 144,180 張選票，致使同黨候選人尤宏以 44,385 票飲恨敗北，若是余政憲能將一部分選票轉移給尤宏，那麼他便會取代黃河清（得 49,657 票）而當選。1992 年二屆立委選舉，趙少康亦席捲了 235,887 張台北縣選民票，而當時該選區的最後一名當選者李顯榮僅獲得 36,953 票；同年，台北市的王建 獲得 129,019 票，而同選區的洪濬哲僅得 21,060 票便當選了。反之，如果大家都從事策略投票，則可能發生超級候選人反而被放棄的情況。

為了解決此種不確定狀態，政黨在提名時除了儘量提名票源重疊不太嚴重的候選人外，也考慮提名的人數不宜過多。國民黨更是早就有責任區的安排，將選區劃為若干責任區，每一位候選人在其責任區內耕耘，而儘量不要踩到其他候選人的責任區，但是責任輔選制須要強有力的組織動員能力，然而民、新兩黨的組織動員不若國民黨，不可能採取此種方式。民進黨剛成立後的幾次選舉，不時發生呼聲最高，被認為穩當選的候選人慘遭滑鐵盧，或候選人得票過高，致使選票浪費的情況，在記取此種制度之下所可能造成的後果的教訓下，政黨和選民皆可能想辦法適當轉移選票，讓其平均分配於有機會當選的候選人，因此便有選民自動配票以及政黨強制配票的策略出現。不管是選民自動配票或是政黨或候選人利用傳播媒體呼籲選民配票，在筆者認為皆屬於策略性投票，因為經過了幾次教訓後，選民開始意識到要將自己的選票做最充分的運用，使選票不致浪費，更能極大化所屬政黨席次，因此不再依他原有的第一偏好來投票。但是自動配票的方式比單一選區之策略投票對資訊之需求更甚。選民除了要知道那一位在民意調查中是在領先群，邊緣群或者是落後群之外，政黨在該選區可以當選的人數也必須要在評估之內。如果該黨在選區中的選票無法讓那麼多候選人當選時，在民意調查中落後群的候選人可能在自動配票過程中被選民放棄。在筆者之深入訪談過程中，確實發現家庭中成員在自動配票過程中，會排除毫無希望當選的候選人

或者是排除他們不喜歡或認為操守不好、形象不好的候選人，然後再配票。

除了國民黨的責任配票早在多年前便進行外，政黨或候選人有意識的於大眾傳播媒體以及各種競選場合宣揚「聯合競選，平均配票」理念是在 1995 年與 1998 年的立委選舉。民進黨在 1995 年台北市南區立委選舉，提出了四季紅依據出生月的配票方式，1998 年繼續於南區採取「四季紅」策略，在北區則提出「五福臨門」，根據身份證號碼尾數配票。同時，新黨也在三屆立委選舉分別在台北市南、北兩區、台北縣及桃園縣等四個選區採取所謂的強制配票。民進黨與新黨是透過媒體宣傳的方式要求支持該黨的選民進行配票，不過此種配票方式主動權仍操於選民個人。換言之，選民是否願意完全依據政黨的規劃來配票或投票仍是不確定。另外，該政黨在該選區提名的候選人在個人聲望與獲票能力上必須旗鼓相當，若是候選人素質良莠不齊，便會增加配票的困難度（游清鑫，1996）。除此之外，若是在選區中支持該黨的選民票數不夠，也會導致此種策略之失敗。

第三屆立委選舉是歷年來立法委員選舉競爭最激烈的一次，因此策略性投票的可能性便提高，當問及選民他投下一票時是欣賞誰就把選票投給誰，還是會考慮選情之發展再決定把選票投給誰時，有 62.8% 之受訪者回答前者，22.6% 之受訪者回答後者，此 22.6% 之選民便是可能的策略性投票者，此百分比英國選民多出不少。複數選區中，由於候選人眾多，一般問卷中不可能有選民之候選人偏好等問題，而事實上選民不見得有唯一的偏好，有時候甚至有二或三位，爲了不使選票浪費，同時爲了使自己屬意之政黨席次極大化，才會有視選情發展而作的投票。當被問及爲了政黨在同一選區內當選較多席次，是否根據政黨建議的配票方式投票，有 10.9% 之受訪者表示是按政黨建議方式投票。另外，有 8.8% 的受訪者表示爲了讓自己政黨得到更多席次而與自己的家人、親友協調，把選票自動分配給好幾位同黨的候選人。由此可見，此兩類選民是基於選票的充分運用以及極大化政黨在選區席次而作之策略性投票。

若是我們更進一步地將政黨有特別在大眾傳播媒體呼籲選民按照出生月

或身份證字號尾數配票的台北市、台北縣與桃園縣地區，與其他地區比較，我們確實可以發現這些地區策略投票選民比例較高。在台北桃園地區依政黨建議而投票的選民有 17.3%，而其他地區只有 11.1%，相差 6.2%（見表二）。至於與家人或親友協調，自動配票給同一選區選民的在北桃地區有 15.8%，而在其他地區只有 8.9%，相差 6.9%（見表三）。換言之，政黨在策略上有特別宣傳選民配票以增加政黨席次之地區，從事策略投票之選民有顯著增加，但是增加百分比仍然有限。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即使是政黨未在大眾傳播媒體宣傳之地區，仍是有不少選民進行策略投票，顯示的意義為在此種投票制度之下，擔心政黨席次會因配票不均而減少席次的選民，自然會有自動配票之行爲。

從表四可以明顯看出，民進黨剛成立後的兩次立委選舉---1989 年與 1992 年，國民黨與民進黨在台北市選區內該黨提名的候選人得票最高者與得票最低者之比值相當高，表示該黨候選人之得票分配不均，但是 1995 年與 1998 年由於政黨與選民皆企圖平衡選票資源，使得比值下降。這些資料更進一步顯示，藉由媒體和菁英的宣傳，使得選民投票的思考模式在轉變。

表二、政黨配票區與是否依政黨建議投票（第三屆立委選舉）

	北市、北縣、桃縣	其他地區	橫向百分比
依政黨建議配票	17.3% (66)	11.1% (85)	13.1% (151)
未依政黨建議配票	82.7% (315)	88.9% (683)	86.9% (998)
Chi-square= 8.19 D.F.= 1 P= 0.0004 N= 1149			

資料來源：政治體系變遷與選舉行爲：民國八十四年第三屆立法委員選舉研究。

表三、政黨配票區與選民是否自動配票（第三屆立委選舉）

	北市、北縣、桃縣	其他地區	橫向百分比
自動配票	15.8% (56)	8.9% (65)	11.2% (121)
未自動配票	84.2% (298)	91.1% (666)	88.8% (964)
Chi-square= 10.86 D.F.=1 P= 0.0001 N=1085			

資料來源：政治體系變遷與選舉行為：民國八十四年第三屆立法委員選舉研究。

表四、台北市立委選舉政黨提名候選人最高票與最低票之比

	台北市第一選區		台北市第二選區	
	中國國民黨	民主進步黨	中國國民黨	民主進步黨
1989年	4.80	4.69	2.40	1.98
1992年	8.81	10.02	7.20	5.22
1995年	2.08	2.70	2.97	1.18
1998年	2.07	2.04	1.99	3.08

資料來源：民國七十八年增額立委選舉實錄；民國八十一年第二屆立委選舉實錄；中央選舉委員會與政大選舉研究中心，歷屆公職人員選舉資料庫。

根據 Niemi et al. (1992) 的分析，在單一選區中政黨認同越強者，策略投票越不可能。然而在複數選區中，正好相反，政黨認同強者爲了要增加該政黨之席次，因此策略性投票越有可能。表五顯示第三屆與第四屆立委選舉各政黨的強烈認同者根據政黨建議自動配票者皆明顯地高於該政黨的一般偏好者，例如：第四屆立委選舉時，強烈國民黨支持者依其政黨建議而配票者佔 25%，但一般支持者僅有 12.9%；民進黨強烈支持者爲 23.7%，一般偏好者 13.2%，不過新黨在第三屆立委選舉時氣勢很盛，強烈支持新黨者依政黨建議配票之比例高達 42.5%，但是到了第四屆時，強烈認同新黨之比例減少很多，只有九個受訪者，因此造成沒有人依政黨建議配票的情況；另外一方面，也可能是因爲該屆立委選舉時，新黨本身配票政策不明確，不似三屆立

委選舉時那麼清楚。還有，在大部分選區新黨只提出一名候選人，就不可能有配票問題。

如果我們更進一步觀察政黨認同之強烈與家人或親戚朋友自動配票之間的關係，其結果亦同樣顯示政黨認同愈強烈者愈可能進行家庭成員間之自動配票，以免選票過於集中，極大化政黨於選區之席次。表六中第四屆立委的家人自動配票百分比完全符合本文預期模式，唯有第三屆立委選舉民進黨偏好者的自動配票比例略高於民進黨的強烈認同者。若比較第三屆與第四屆立委選舉，可以發現國民黨強烈支持者不管在依政黨建議配票或在家庭成員自動配票方面比例在第四屆立委選舉都高於第三屆立委選舉時，或許是因為如此，國民黨在第四屆立委的席次才因此增加。

表五、政黨認同強度與政黨配票

第三屆立委選舉									
	強烈 國民黨 支持者	強烈 民進黨 支持者	強烈 新黨 支持者	其他政 黨強烈 支持者	國民黨 偏好者	民進黨 偏好者	新黨 偏好者	不偏任 何政黨	橫向 百分比
根據政黨建議自動配票	19.4% (33)	22.6% (12)	42.5% (17)	40.0% (2)	10.8% (20)	18.1% (21)	18.7% (14)	6.6% (31)	13.5% (150)
未根據政黨建議自動配票	80.6% (137)	77.4% (41)	57.5% (23)	60.0%(3)	89.2% (165)	81.9% (95)	81.3% (61)	93.4% (440)	86.5% (965)
Chi-square=65.15 D.F.=7 P=0.0000 N= 1115									
第四屆立委選舉									
	強烈 國民黨 支持者	強烈 民進黨 支持者	強烈 新黨 支持者	國民黨 偏好者	民進黨 偏好者	新黨 偏好者	其他 政黨 支持者	不偏任 何政黨	橫向 百分比
根據政黨建議自動配票	25.0% (14)	23.7% (9)	0	12.9% (37)	13.2% (33)	19.0% (12)	12.5% (5)	6.0% (18)	12.3% (128)
未根據政黨建議自動配票	75.0% (42)	76.3% (29)	100% (9)	87.1% (250)	86.8% (217)	81.0% (51)	87.5% (35)	94.0% (283)	87.7% (916)
Chi-square=28.36 D.F.=7 P=0.0002 N= 1044 (不包括未投票及不回答者)									

資料來源：1. 政治體系變遷與選舉行為：民國八十四年第三屆立法委員選舉研究。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政治體系變遷與選舉行為研究室。

2. 政治體系變遷與選舉行為：民國八十七年第四屆立法委員選舉之分析。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政治體系變遷與選舉行為研究室。

我們前面提到在複數選區中配票之目的乃是減少選票浪費，極大化政黨在該選區之席次，因此越關心選舉結果的人越可能採取配票的行為。表七與表八的結果明顯地印證了本文的假設。從表七中我們可以發現根據政黨建議投票者隨著對選舉結果關心程度而越來越高。第三屆立委選舉時，那些表示很不關心選舉結果者，並無人表示根據政黨建議投票，而表示非常關心選舉結果者，則有 20.0% 表示會根據政黨建議投票。同時，表八顯示選民自動配票與否亦與對選舉結果關心程度有顯著之關係。

表六、政黨認同強度與自動配票

第三屆立委選舉									
	強烈國民黨支持者	強烈民進黨支持者	強烈新黨支持者	其他政黨強烈支持者	國民黨偏好者	民進黨偏好者	新黨偏好者	不偏任何政黨	橫向百分比
家人自動配票	11.3% (17)	21.3% (10)	25.8% (8)	0	9.6% (17)	26.2% (27)	13.4% (9)	6.2% (29)	11.2% (117)
未自動配票	88.7% (133)	78.7% (37)	74.2% (23)	100%(3)	90.4% (161)	73.8% (76)	86.6% (58)	93.8% (441)	88.8% (932)
Chi-square= 48.12 D.F.=7 P=0.0000 N= 1049									
第四屆立委選舉									
	強烈國民黨支持者	強烈民進黨支持者	強烈新黨支持者	國民黨偏好者	民進黨偏好者	新黨偏好者	其他政黨支持者	不偏任何政黨	橫向百分比
家人自動配票	19.6% (9)	20.7% (6)	22.2% (2)	9.6% (17)	14.6% (38)	16.7% (9)	11.8% (4)	7.0% (20)	13.1% (123)
未自動配票	80.4% (37)	79.3% (23)	77.8% (7)	90.4% (161)	85.4% (223)	83.3% (45)	88.2% (30)	93.0% (264)	86.9% (814)
Chi-square= 15.61 D.F.=7 P=0.0289 N=937									

- 資料來源：1. 政治體系變遷與選舉行為：民國八十四年第三屆立法委員選舉研究。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政治體系變遷與選舉行為研究室。
2. 政治體系變遷與選舉行為：民國八十七年第四屆立法委員選舉之分析。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政治體系變遷與選舉行為研究室。

表七、對選舉結果關心程度與依政黨配票之關係

	非常關心 選舉結果	還算關心 選舉結果	不太關心 選舉結果	很不關心 選舉結果	橫 向 百分比	
第三屆立委 選舉根據政 黨建議投票	20.2% (80)	10.3% (57)	8.6% (12)	0	13.4% (149)	Chi-Square=26.96 D.F=3 P=0.0000 N=1114
第四屆立委 選舉根據政 黨建議投票	16.9% (21)	15.5% (33)	10.0% (63)	5.4% (9)	11.1% (126)	Chi-Square=14.76 D.F=3 P=0.002 N=1133

資料來源：1. 政治體系變遷與選舉行為：民國八十四年第三屆立法委員選舉研究。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政治體系變遷與選舉行為研究室。
2. 政治體系變遷與選舉行為：民國八十七年第四屆立法委員選舉之分析。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政治體系變遷與選舉行為研究室。

表八、對選舉結果關心程度與家庭成員自動配票之關係

	非常關心 選舉結果	還算關心 選舉結果	不太關心 選舉結果	很不關心 選舉結果	橫 向 百分比	
第三屆立 委選舉有 自動配票	16.9% (60)	9.4% (50)	7.2% (10)	0	11.4% (120)	Chi-Square=18.55 D.F=3 P=0.0003 N=1051
第四屆立 委選舉有 自動配票	21.9% (23)	17.4% (33)	9.5% (34)	10.4% (17)	12.3% (127)	Chi-Square=18.24 D.F=3 P=0.0004 N=1029

資料來源：1. 政治體系變遷與選舉行為：民國八十四年第三屆立法委員選舉研究。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政治體系變遷與選舉行為研究室。
2. 政治體系變遷與選舉行為：民國八十七年第四屆立法委員選舉之分析。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政治體系變遷與選舉行為研究室。

第四屆立委選舉時，增加一道是否在乎候選人輸贏之題目。表九中顯示不管是依據政黨建議配票或是家庭內成員自動配票之比例都是隨著受訪者在乎候選人輸贏之程度而增加。回答非常在乎候選人輸贏者，有 21.6% 表示依政黨建議配票，相當在乎者 14.1%，還算在乎者 9.4%，一點都不在乎者只有 8.3%。同樣地，表示非常在乎候選人輸贏者中，有 23.6% 受訪者之家人會自動配票以增加政黨席次，相當在乎者有 15.5%，還算在乎者有 12.8%，一點

都不在乎者僅有 7.5%。(見表十)

我們很難從單一選區與複數選區選舉中的問卷題目找出共同的題目來分析，不過若是我們比較兩次選舉中選民對選情發展的考慮，有趣的對比產生了。由於 1996 年總統大選有四組人馬競選，且四位候選人的實力皆不弱，因此回答會考慮選情的發展再決定把票都給最需要支持的候選人的百分比便高於第三屆立委選舉。更進一步若我們以對政黨忠誠之程度來分，便可以發現在第三屆立委選舉中，政黨認同越強烈者，考慮選情發展再投票者之百分比越高(見表十一)；反之，在總統大選中，強烈政黨認同者與其他選民比較，考慮選情發展再投票者之百分比越低(見表十二)³。此種發現驗證 Niemi et al. (1992) 和 Lanoue & Bowler (1992) 的假設，單一選區相對多數選舉，政黨認同愈強者，愈不會從事策略投票行為。複數選區中選民為極大化政黨席次，因此政黨認同愈強者，越會考慮選情，再決定把票投給需要支持之人。在單一選區中，一個政黨只提名一位候選人，政黨認同強者自然支持該黨所提名之候選人，而毋需考慮當時的選情；政黨認同不那麼強者，如果在候選人超過兩個時，便較有可能從事策略性投票，因此較會視選情發展而投票。

我們更進一步發現，單一選區中政黨認同越強者對其支持者從一而終，較不會考慮其他候選人；但是政黨認同弱者，面臨多位候選人可選，以及「棄誰保誰」的各種口語及謠言之下，較為猶豫不決。表十三中得知，1996 年總統選舉時，強烈國民黨支持者有 73.3% 表示未考慮選擇其他候選人；偏國民黨者則降為 60.8%；在民進黨方面，強烈認同民進黨者有 60.9% 之受訪者未考慮投票給其他候選人，而偏民進黨者之百分比便降為 39.0%。高度認同新黨者，只有 34.9% 表示未考慮其他候選人，這可能與新黨並未真正推出自己的候選人，而其支持者在林洋港及陳履安兩組徘徊之故；偏向新黨者未考慮其他候選人之百分比更低了，僅有 26.6%。

表九、在乎候選人輸贏與是否依政黨配票之關係

3. 民國87年的立委選舉和台北市長選舉並沒有同樣的題目可以比較，因此只好比較84年底的立委選舉與85年初之總統選舉。

(第四屆立委選舉)

	非常在乎	相當在乎	還算在乎	一點都不在乎	橫向百分比
依據政黨建議配票	21.6% (29)	14.1% (27)	9.4% (36)	8.3% (35)	11.2% (127)
未依政黨建議配票	78.4% (105)	85.9% (164)	90.6% (345)	91.7% (389)	88.8% (1003)
Chi-Square=21.15 P=0.0001 D.F.=3 N=1130					

資料來源：政治體系變遷與選舉行為：民國八十七年第四屆立法委員選舉之分析。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政治體系變遷與選舉行為研究室。

表十、在乎候選人輸贏與家人是否自動配票之關係

(第四屆立委選舉)

	非常在乎	相當在乎	還算在乎	一點都不在乎	橫向百分比
家人自動配票	23.6% (26)	15.5% (26)	12.8% (45)	7.5% (30)	12.4% (127)
未自動配票	76.4% (84)	84.5% (142)	87.2% (306)	92.5% 368	87.6% (900)
Chi-Square=23.02 P=0.0000 D.F.=3 N=1027					

資料來源：政治體系變遷與選舉行為：民國八十七年第四屆立法委員選舉之分析。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政治體系變遷與選舉行為研究室。

表十一、政黨認同強度與選情發展考慮---第三屆立委選舉

	強烈國民黨支持者	強烈民進黨支持者	強烈新黨支持者	其他政黨強烈支持者	國民黨偏好者	民進黨偏好者	新黨偏好者	不偏任何政黨	橫向百分比
不考慮選情發展	66.3% (116)	60.7% (34)	64.1% (25)	60.0% (3)	77.2% (152)	70.8% (80)	65.0% (52)	79.1% (375)	73.5% (837)
考慮選情發展	33.7% (59)	39.3% (22)	35.9% (14)	40.0% (2)	22.8% (45)	29.2% (33)	35.0% (28)	20.9% (99)	26.5% (302)
Chi-square=24.02 D.F.=7 P=0.0011 N= 1139									

資料來源：政治體系變遷與選舉行為：民國八十四年三屆立法委員選舉研究。

表十二、政黨認同強度與選情發展考慮---1996年總統選舉

	強烈 國民黨 支持者	強烈 民進黨 支持者	強烈 新黨 支持者	其他政 黨強烈 支持者	國民黨 偏好者	民進黨 偏好者	新黨 偏好者	不偏任 何政黨	橫向 百分比
不考慮 選情發展	69.5% (155)	67.8% (59)	72.1% (31)	100% (1)	56.4% (110)	53.3% (65)	67.1% (53)	66.0% (282)	64.2% (756)
考慮 選情發展	30.5% (68)	32.2% (28)	27.9% (12)	0.0% (0)	43.6% (85)	46.7% (57)	32.9% (26)	34.0% (145)	35.8% (421)
Chi-square=17.35 D.F.=7 P=0.0153 N= 1177									

資料來源：游盈隆主持，1996總統選民研究。

表十三、政黨認同強度與考慮其他候選人---1996總統選舉

	強烈 國民黨 支持者	強烈 民進黨 支持者	強烈 新黨 支持者	其他政 黨強烈 支持者	國民黨 偏好者	民進黨 偏好者	新黨 偏好者	不偏任 何政黨	橫向 百分比
有考慮其他 候選人	26.7% (60)	39.1% (34)	65.1% (28)	0.0% (0)	39.2% (78)	61.0% (75)	73.4% (58)	40.8% (180)	42.8% (513)
未考慮其他 候選人	73.3% (165)	60.9% (53)	34.9% (15)	100% (1)	60.8% (121)	39.0% (48)	26.6% (21)	59.2% (261)	57.2% (685)
Chi-square=82.51 D.F.=7 P=0.0000 N= 1198									

資料來源：游盈隆主持，1996總統選民研究。

前面提到在複數選區中，越認同政黨者越可能是依政黨要求配票或自動配票。一般而言，民進黨和新黨的配票方式或家庭中的自動配票，是不會將家庭中所有選票皆投給同一位候選人。但是在單一選區中，高度政黨認同者勢必會要求家人投票給自己政黨所提名之候選人，因此政黨認同越高者，家人全部投給同一候選人之情況便越多；反之，便越少，由表十四的總統選舉以及表十五的台北市長選舉可以得到證實。

表十四、政黨認同強度與家庭投票---1996 總統選舉

	強烈 國民黨 支持者	強烈 民進黨 支持者	強烈 新黨 支持者	其他政 黨強烈 支持者	國民黨 偏好者	民進黨 偏好者	新黨 偏好者	不偏任 何政黨	橫向 百分比
全部投給同一候選人	56.8% (126)	43.8% (39)	37.0% (17)	50.0% (1)	45.5% (92)	36.5% (46)	18.8% (15)	26.9% (121)	37.6% (457)
大部份投給同一候選人	10.8% (24)	7.9% (7)	10.9% (5)	50.0% (1)	7.4% (15)	10.3% (13)	8.8% (7)	7.1% (32)	8.6% (104)
一半一半	2.7% (6)	11.2% (10)	6.5% (3)		2.0% (4)	10.3% (13)	15.0% (12)	4.5% (20)	5.6% (68)
各投各的	29.7% (66)	37.1% (53)	45.7% (21)	0.0% (0)	45.0% (91)	42.9% (54)	57.5% (46)	61.5% (276)	48.3% (587)
Chi-square=124.72 D.F.=21 P=0.0000 N= 1216									

資料來源：游盈隆主持，1996 總統選民研究。

表十五、政黨認同強度與家庭投票---1998 台北市長選舉

	強烈 國民黨 支持者	強烈 民進黨 支持者	強烈 新黨 支持者	國民黨 偏好者	民進黨 偏好者	新黨 偏好者	其他 政黨 偏好者	不偏任 何政黨	橫向 百分比
全部投給同一候選人	88.6% (31)	76.7% (23)	45.5% (5)	50.7% (112)	60.5% (118)	51.9% (41)	55.2% (16)	43.1% (118)	53.1% (464)
大部份投給同一候選人	5.7% (2)	6.7% (2)	9.1% (1)	10% (22)	14.9% (29)	11.4% (9)	6.9% (2)	10.6% (29)	11.0% (96)
各投各的	5.7% (2)	16.7% (5)	45.5% (5)	39.4% (87)	24.6% (48)	36.7% (29)	37.9% (11)	46.4% (127)	35.9% (314)

資料來源：政治體系變遷與選舉行為：民國八十七年台北市長選舉研究。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政治體系變遷與選舉行為研究室。

六、結 論

選舉為民主國家之命脈，而選舉必須有遊戲規則之存在，即選舉制度。選舉制度除了規範了選區的大小，選票的結構，選票轉換為席次的方式，門檻的高低以及選舉的時間外，更重要的它會更進一步影響選民投票的行為。

國內外有關選舉制度研究多把重點放在其對政黨體系以及政黨席次分配之比例性的影響，鮮少把焦點放在制度是否影響選民之投票行為。換言之，在不同選舉制度下選民投下其神聖的一票時，是否會有不同之思考模式？特別是當候選人多於二，且選舉競爭激烈時，選民做策略投票時，是否因不同的制度而有不同之思考模式？國內在民意代表選舉皆採取複數選區單記投票法，在行政首長方面則採取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此兩種制度之差異正好提供了我們對不同選舉制度下選民策略投票之比較基礎。

本文利用歷屆選舉政黨得票率變化的百分比，驗證在單一選區中選民的策略投票為黨際間選票之轉移，在單一選區中如果有三個或三個政黨存在時，實力較弱的政黨為避免選票浪費，會將選票轉給兩大黨中他較不討厭的政黨，所以選票轉移是從一個政黨轉向另外一個政黨。反之，複數選區的選票轉移是黨內間之轉移，即選民為了極大化政黨在選區內之席次，而將選票從該黨中的某一位候選人轉移到另外一位候選人。本文確實發現歷屆行政首長選舉的各政黨得票率之波動程度遠高於複數選區之選舉。

利用台大政治學研究所政治體系變遷與選舉行為研究工作室之調查訪問資料顯示在單一選區中，政黨認同愈強者越不可能進行策略性投票，因為此意味將其寶貴之一票投給他黨。相反地，在複數選區中，政黨認同越強者，越可能進行策略性投票，因其選票之轉移是在同黨內候選人之間，其目的是為了增加該政黨在選區內之席次。另外，在單一選區選舉，政黨認同愈強者其家人越可能支持同一候選人，而在複數選區中，如果政黨提名多名候選人，則為了增加該黨之席次，政黨認同愈強者，全家越不可能投給同一候選人。

不過，不管是在那一種選舉制度之下，對選舉結果越關心者越可能從事策略性投票。

本文對於單一選區與複數選區相對多數制下的選民投票行為做了初步的比較，從本研究結果可以發現不同的選舉制度下，選民確實有不同的策略投票思考模式。不過由於問卷調查資料本身並未針對此主題設計，且不同的選舉所問的題目略有不同，因此造成比較上之困擾。若是將來欲做更進一步之比較，在問題設計上需多加思量，譬如；不同的選舉的問卷題目要相同，及需要知道選民的第一偏好。

附 錄

* 1996 年總統選舉題目：

在這次選舉中，有些選民是欣賞誰就投給誰，不考慮選情的發展；也有選民會考慮選情的發展，把票投給需要支持的總統候選人。請問你自己的情況怎麼樣？

在這次總統選舉中，您家人的投票情況如何？

* 1998 年台北市長選舉題目：

您的家人是否都投給同一位候選人？

* 第三、四屆立委選舉：

在這次立委選舉，有很多選民爲了想讓自己支持的政黨在同一選區當選較多席次，願意根據政黨建議的配票方式來投票，請問您是不是也是這樣？

有很多人爲了想讓自己支持的政黨在同一選區當選較多的席次，而與自己的家人、親友協調，把選票自動分配給好幾位同黨的候選人，請問您是不是也是這樣？

請問您的家人通常投票給那一個黨的立法委員候選人？

在這次立委選舉中，有些選民是最欣賞誰就投給誰，不考慮選情的發展；也有些選民會考慮選情的發展，把票投給最需要支持的候選人。請問您自己的情況怎麼樣？

請問您對這次立法委員選舉的選情關心的程度怎樣？

* 第四屆立委選舉：

請問這次立法委員選舉，您在不在乎那一位候選人選輸或選贏？

參考書目

- Blais, Andre, and Richard Nadeau. 1996. "Measuring Strategic Voting: A Two-Step Procedure." *Electoral Studies* 15 (1): 39-52.
- Cain, Bruce E. 1978. "Strategic Voting in Britai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2 (August): 639-55.
- Catt, H. 1989. "Tactical Voting in Britain." *Parliamentary Affairs* 42: 548-559.
- Cox, Gary W. 1984. "Strategic Electoral Choice in Multi-Member Districts: Approval Voting in Practi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8: 722-738.
- . 1994. "Strategic Voting Equilibria under the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8 (3)(September): 608-621.
- Cox, Gary W., and Michael Munger. 1989. "Closeness, Expenditures, and Turnout in the 1982 U.S. House Elec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3: 217-231.
- Cox, Gary W., and Emerson Niou. 1994. "Seat Bonuses under the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System: Evidence from Japan and Taiwan." *Comparative Politics* 26: 221-236.
- Cox, Gary W. 1997. *Making Votes Count: Strategic Coordination in the World's Electoral Systems*. New York: Cambridge.
- Downs, Anthony. 1957.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Row.
- Duverger, Maurice. 1954.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N.Y.: Wiley.
- Evans, Geoffrey. 1994. "Tactical Voting and Labour's Prospects." Anthony Heath, Roger Jowell, John Curtice and Bridget Taylor, ed., *Labour's Last Chance? The 1992 Election and Beyond*. Aldershot: Dartmouth.
- Evans, Geoffrey, and Anthony Heath. 1993. "A Tactical Error in the Analysis of Tactical Voting: A Response to Niemi."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3: 131-137.

- Fey, Mark. 1997. "Stability and Coordination in Duverger's Law: A Formal Model of Pre-election Polls and Strategic Vot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1 (1) (March): 135-147.
- Fieldhouse, E. A., C. J. Pattie, and R. J. Johnson. 1996. "Tactical Voting and Party Constituency Campaigning at the 1992 General Election in England."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6: 403-39.
- Galbraith, John W., and Nicol C. Rae. 1989. "A Test of the Importance of Tactical Voting: Great Britain, 1987."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 126-136.
- Grumm, John. 1958. "Theories of Electoral Systems." *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II (November) :357-76.
- Heath, Anthony, Roger Jewell, John Curtice, Geoffrey Evans, Julia Field, and Sharon Witherspoon. 1991. *Understanding Political Change: The British Voter 1964-1987*. Oxford: Pergamon Press.
- Hsieh, John Fuh-Sheng. 1991.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The Car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aiwan*.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Manuscript.
- Hsieh, John Fuh-Sheng, Emerson M.S. Niou, and Philip Paolino. 1997. "Strategic Voting in the 1994 Taipei City Mayoral Election." *Electoral Studies* 16 (2): 153-63.
- Hsieh, John Fuh-Sheng, and Richard G. Niemi. 1998. "Can Duverger's Law be Extended to SNTV? The Case of Taiwan's Legislative Yuan Elections." *Electoral Studies* 18: 101-116.
- Jeese, G. Neal. 1999. "Candidate Success in Multi-Member Districts: An Investigation of Duverger and Cox." *Electoral Studies* 18: 323-340.
- Johnston, R. J., and C. J. Pattie. 1991. "Tactical Voting in Great Britain in 1983 and 1987: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1: 95-128.
- Johnston, Richard. 1992. "Party Identification Measures in the Anglo-American Democracies: A National Survey Experi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6 (2)(May): 542-59.

Katz, R. 1980. *A Theory of Parties and Electoral System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Laakso, Marku, and Rein Taagepera. 1979. "Effective Number of Parties: A Measure with Application to West Europ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12: 3-27.

Lanoue, David J., and Shaun Bowler. 1992. "The Sources of Tactical Voting in British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1983-1987." *Political Behavior* 14 (2): 141-157.

Lijphart, Arend. 1984. *Democracies: Patterns of Majoritarian and Consensus Government in Twenty-one Countr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90.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lectoral Laws, 1945-1985."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4: 481-496.

———. 1994. *Electoral Systems and Party System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nn, Thomas E., and Raymond E. Wolfinger. 1980. "Candidates and Parties in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4: 617-32.

Niemi, Richard, Gary Whitten, and Mark N. Franklin. 1992. "Constituency Characteristics,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nd Tactical Voting in the 1987 British General Electio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2: 229-254.

Niemi, Richard. 1984. "The Problem of Strategic Voting under Approval Vot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8: 952-58.

Ordershook, Peter C., and O. V. Shvetsova. 1994. "Ethnic Heterogeneity, District Magnitude, and the Number of Par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8 (February): 100-23.

Powell, G. Bingham, Jr. 1982. *Contemporary Democracies: Participation, Stability, and Viole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ae, Douglas. 1967.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lectoral Law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Reed, Steven R. 1991. "Structure and Behavior: Extending Duverger's Law to the

- Japanese Cas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 335-56.
- . 1999. “Strategic Voting in the 1996 Japanese General Elect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2 (2) (April): 257-270.
- Riker, William H. 1982. “The Two-Party System and Duverger's Law: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Sci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6: 753-66.
- . 1986. “Duverger’s Law Revisited.” Bernard Grofman and Arend Lijphart, ed., *Electoral Laws and Their Political Consequences*: 19-42. New York: Agathon Press.
- Shamir, Michal. 1985. “Changes in Electoral Systems as “Interventions”: Another Test of Duverger’s Hypothesi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13: 1-10.
- Shively, W. Phillips. 1970. “The Elusive Psychological Factor.” *Comparative Politics* 3 (October): 129-134.
- . 1980. “The Nature of Party Identification: A Review of Recent Developments.” John C. Pierce and John L. Sullivan, ed., *The Electorate Reconsidered*.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 Spafford, Duff. 1972. “Electoral Systems and Voter’s Behavior.” *Comparative Politics* 5: 129-134.
- Steed, Machael. 1985. “The Constituency.” Vernon Bogdanor, ed.,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eople: Parliamentarians and Constituent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Aldershot, Hants, England: Gower.
- Taagepera, Rein, and Grofman Bernard. 1985. “Rethinking Duverger’s Law: Predicting the Effective Number of Parties in Plurality and PR System—Parties Minus Issues Equals 1.”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13: 341-352.
- Taagepera, Rein, and Matthews S. Shugart. 1989. *Seats and Votes: The Effects and Determinants of Electoral System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王業立。1996。〈相對多數 V.S 絕對多數：各國總統直選方式的比較研究〉。

- 《選舉研究》3(1)：49-67。
- 。1998。《比較選舉制度》。台北：五南。
- 洪永泰。2000。〈政治版圖重組：2000年總統選舉的選後評估〉。「選舉研究學術研討會」，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 莊文忠。2000。〈選舉預測與策略性投票：以八十九年總統選舉為例〉。《理論與政策》14(2)：55-91。
- 游清鑫。1996。〈選舉制度、選舉競爭與選舉策略：八十四年北市南區立委選舉策略之個案研究〉。《選舉研究》3(1)：137-178。
- 黃德福、張佑宗。2000。〈族群動員、李登輝因素與策略性投票：台灣2000年總統選舉投票行為的分析〉。「選舉研究學術研討會」，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 劉義周。2000。〈2000年總統選舉候選人棄保策略之分析〉。「選舉研究學術研討會」，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 謝復生。1986。〈選舉制度與政黨多寡---兼論科學法則的建立〉。《國立政治大學學報》54：151-63。
- 。1986。《政黨比例代表制》。台北：理論與政策雜誌社。
- 。1989。〈從選舉制度與選民結構看我國今後政黨政治的走向〉。《中山社會科學季刊》4(3)：30-9。

A Comparison of Voters' Strategic Voting in Single Member and Multiple Member Districts Plurality System

Shiow-Duan Hawang *

Researches on voting behavior have rested very heavily on evidence from either the U.S. or British experiences. They both have single member district plurality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voters are generally making one choice between two alternatives. When the voters choose the party, they also choose the party's candidate, when the voters pick up the candidate, they also pick the party he represented. But in Taiwan, most legislator elections are based on multiple member districts, voters only have a single vote, regardless of the district magnitude, and votes are not transferable to other candidates of the same party. In order to maximize their seats in the district, parties usually nominate more than one candidate in a district, thus, candidates from the same party will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Since the votes are not transferable, it is dangerous if one candidate is so popular that captures most of the votes for his party, while other candidates of his party in the district will not get elected. How to distribute the votes among its candidates in order to win as many seats as possible becomes a major task for the parties in the system. For the voters, facing so many candidates from the same party, party identification may not be enough for them to vote, they need other cues. Moreover, in order to see their party gain maximum seats, voters may vote strategically.

The results of this paper indicate that electoral system do make voters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choices differently. In a single member district plurality system, strategic voters cast their votes from one weak party to the other strong party, it is inter-party transference. On the other hand, in multiple member district, in order to maximize their seats in the district, people transfer their votes from one candidate to another candidate among the candidates of the same party, so it is intra-party transference.

Moreover, from the survey research data, we also find that in a single member district, the stronger the party identification, the less they will do the strategic vote; on the contrary, in multiple member district, the stronger the party identification, the more they will do strategic voting.

Keywords: strategic voting, electoral system, single member district plurality system,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system (SNTV), party choice, party identification, vote equalization